

ZHONG GUO HONG JUN CHANG ZHENG SHI

中国红军长征史

● 力平 余熙山 殷子贤 著



406

中共党史出版社

97
K264.406
16
2

中国红军长征史

力平 余熙山 殷子贤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6年·北京

542036

责任编辑:霍海丹 李禄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红军长征史/力平等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8
ISBN 7-80023-959-4

I.中… II.力… III.二万五千里长征(1934~1936)-历史
N.K2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8384 号

中国红军长征史

力平 余熙山 殷子贤著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通讯处:北京 1929 信箱 邮编:100091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35 号

电话:(010)62581570 传真:(010)62581532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北京春雷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 10.75 印张 265 千字
1996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5000 册

ISBN 7-80023-959-4/K·879

定 价:15.50 元

前 言

本世纪 30 年代中国红军的长征,是一首永恒的史诗。它不但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受到了广泛的赞扬。毛泽东曾经说,“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在长征中,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而使中国革命开始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最终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

在新中国即将成立之际,毛泽东又说:“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建设起强大的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一个更加艰巨更为重大的任务,我们必须进行新的长征,使百年来饱受欺凌和压榨的中华民族彻底扬眉吐气,更加坚实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在这场新的长征中,我们仍然需要学习 60 年前红军长征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发扬当年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发愤图强,奋勇前进!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准备战略转移	1
第一节 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1
第二节 长征的决定和准备	6
第三节 红七军团北上抗日	11
第四节 红六军团西征	19
第五节 同陈济棠谈判	26
第六节 中央红军准备突围	31
第二章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到达四川懋功地区	45
第一节 中央红军出发西征,突破四道封锁线	45
第二节 通道争斗,黎平转兵,突破乌江,占领遵义	66
第三节 遵义会议,伟大的历史转折	78
第四节 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巧渡金沙江	86
第五节 会理会议,强渡大渡河,到达懋功地区	101
第六节 人民军队,纪律严明	108
第三章 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	119
第一节 张国焘放弃川陕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	119
第二节 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	132
第三节 两河口会议决定共同北上	140
第四节 中共中央率红一、三军北上	161
第五节 张国焘南下失利和中央对他的团结争取	174

第四章 红二十五军长征,红一、三军到达陕北	195
第一节 红二十五军在长征前.....	195
第二节 红二十五军长征到陕北,红十五军团成立	199
第三节 红一、三军到陕北,同红十五军团会师.....	205
第四节 直罗镇战役,革命领导中心奠基陕北	211
第五节 瓦窑堡会议,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确立与发展 ..	221
第六节 红一方面军东征与西战.....	230
第五章 红二、六军团长征,红二、四方面军北上,	
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258
第一节 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	258
第二节 红二、六军团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276
第三节 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红一方面军积极策应	288
第四节 张国焘意欲西渡黄河.....	313
第五节 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长征结束	326
后 记	338

第一章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 准备战略转移

第一节 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 反“围剿”失败

从1930年11月到1931年9月，在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的领导指挥下，在广大红军指战员的英勇奋战下，中央革命根据地（即中央苏区）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一、二、三次“围剿”。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敌人处于守势，红军在石城、长汀、于都、会昌等县拔除了几百个地主武装土围子，开展了群众工作，使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联成了一片。这时，中央革命根据地已有21个县，面积达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50万，形成了大好局面。

1931年1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实际上是米夫以共产国际远东局名义提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名单，王明进入政治局，不久就成为常务委员。中共中央总负责人虽然仍旧是向忠发，实际大权却由王明操纵。王明推行了一条比李立三“左”倾错误更“左”的“左”倾路线。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共中央就由王明负责。后来，王明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简称临时中央），以秦邦宪（博古）为首，继续贯彻执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政策和主张。

1933年1月，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

开始。敌军约 16 万人，分左中右三路发起进攻。周恩来、朱德等指挥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7 万余人作战。他们在实践中认识到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要求红军先发制人、攻占敌人重兵驻防的南丰和南城命令是错误的，果断地采取了集中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实行大兵团伏击战。在周恩来、朱德等的正确指挥下，红军指战员英勇战斗，先后在黄陂、草台冈打了两仗，共歼灭敌人 3 个主力师，俘敌 1 万余人，缴枪 1 万余支。敌人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基本上被打破。

1933 年 9 月，国民党蒋介石又调集 100 万兵力、200 架飞机，开始向红军发动规模更大的“围剿”。其中，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直接用于进攻的兵力达 50 万。这次“围剿”的特点，在政治上是进一步推行法西斯统治，“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在居民中实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在军事上是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依托堡垒，逐步推进，紧缩根据地，以实现“抽干塘里的水，捉塘里的鱼”，血洗苏区，围歼红军，消灭根据地的目的。这时，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主力有 8 万多人，并且已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地方红军和赤卫队等群众武装组织也有很大发展。如果战略方针、军事指挥正确，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并不是不可能的。

但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实际上却存在着明显的不利因素。首先是 1933 年春，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临时中央在上海存身不住，到了中央苏区。再就是 1933 年 10 月初，共产国际派出的军事顾问李德（德文原名奥托·布劳恩）到达了中央革命根据地。这个李德，不懂中国国情，不调查研究，只知照搬正规战争的经验，依靠地图瞎指挥。博古不懂军事，把军事指挥权完全交给了李德。

1934 年 1 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这次会议是王明“左”倾路线达到顶点的标志，进一步发展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这就使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成为不可避免。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就是在如此情况下开始进行的。1933年9月底，博古、李德确定采取分散兵力打阵地战即“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单纯防御的方针。敌人乘红军分兵作战之际，在9月28日攻占红军兵力薄弱的黎川。这时，王明“左”倾路线领导人在“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指导下，命令进入福建作战的红军“东方军”从福建的将乐、顺昌地区北上就敌，冒险进攻敌人重兵扼守的硝石、资溪桥、浒湾等地，企图收复黎川。这些冒险进攻，不仅遭致重大伤亡，而且使自己陷于被动地位。

1933年10月26日，中国工农红军的代表同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代表草签了抗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1月20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以及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了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这一形势，对红军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十分有利。但是，王明“左”倾路线领导人没有利用这个形势，反而把蔡廷锴等人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不去帮助第十九路军，反而把红军主力西调，便利了蒋介石派军打败第十九路军。后来，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就这次事变做总结和批评王明“左”倾路线时曾说：“当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它的。”但是，王明“左”倾路线领导人不用“此计”，“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①。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这一有利时机，就这样丧失了。

此后，王明“左”倾路线领导人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由进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6页。

攻中的冒险主义变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他们命令红军处处设防，节节抵御，实行阵地战、堡垒战，并以“短促突击”支持这种消极防御。结果，从1934年1月下旬到3月底进行的许多战役、战斗，均遭失利，伤亡重大，仅3月中旬的三溪圩、三坑战斗，红军伤亡就达2200余人。4月中旬，敌人集中兵力进攻广昌，王明“左”倾路线领导人为了拼死保卫广昌，以红军主力9个师同敌人“决战”，从4月10日到27日，打了18天，结果虽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但红军自己伤亡高达5500余人，占红军参战总兵力的1/5；干部伤亡数也很大，有一个团，连级干部只剩下一人。这是一次典型的“拼消耗”仗。这一仗不但没有保住广昌，而且还丢掉了建宁。7月，敌人开始从六个方向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全面进攻。这时，王明“左”倾路线领导人命令红军“分兵把口”，“全线抵御”，与敌人死打硬拼。“六路分兵”抵御的结果，任何一路都未能阻止敌人的前进，反而给敌人造成了各个击破的机会。节节抵御变成了节节败退。这种消极防御，继续使红军兵力受到很大损失，仅驿前以北的防御战，红军伤亡就达2300余人。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进行到这个时候，时间已近一年，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军事指挥，红军元气大伤，中央革命根据地日益缩小，敌人已向基本苏区前进。1934年8月1日，毛泽东在《红星》报上发表了亲笔题词：“敌人已经向我们的基本苏区大举进攻了。我们无论如何要战胜这个敌人。我们要用一切坚定性顽强性持久性去战胜这个敌人。我们这样做就一定能够最后的战胜这个敌人。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英勇奋斗的红军万岁！”毛泽东后来总结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时曾说：“到打了一年之久的时候，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

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①

1934年国际青年节时，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断定：敌人已“从各方面伸入到根据地大门内来，求我决战，实行其占领兴国、石城、汀州，与总攻瑞京（金）的计划”。形势发展到这个程度，在中央苏区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已无可能，只好进行战略大转移。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就这样失败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就这样被王明“左”倾路线葬送了。这是历史的事实。但是，王明否认这个事实，否认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否认由于反“围剿”战争失败而被迫进行长征。他否认这一切的目的，就是企图否认这是其“左”倾路线造成的恶果。例如，1935年1月18日，王明在上海中央局编辑的《斗争》第七十七期发表的《苏维埃中国的情势与新的策略》一文中说：“在英勇斗争的一年中，中国红军获得了光辉的胜利，特别是北方战线上的胜利更为伟大。”“中国红军所以采取新策略”（指中央红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第一个原因是“为反对蒋介石与隆克特将军（德国法西斯军官）在五次进攻中国苏维埃所采取的新的军事计划”，是“为了要颠覆蒋介石、隆克特完全包围中央苏区与逐渐毁灭其人力的计划”，是“为了要创造在五次战役中执行获得决定的与完全的胜利之一切必须先决条件”，更是“为了取得中国苏维埃革命之最后胜利”；第二个原因是出于“民族防卫的必要，即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所企图的宰割中国的必要”；第三个原因是为了“克服中区（指中央革命根据地，下同——引者注）对于军队之各种物质上的困难”。通观王明这篇文章，他所讲的长征的原因就是这三条。他没有一个字提到虽经广大指战员浴血奋战一年，但在其“左”倾路线错误指挥下，到长征出发前夕第五次反“围剿”的险恶形势，也没有一字提到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已无可能，更没有一字提到如果不突围实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20页。

行战略转移,红军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相反,他在这篇文章中闭着眼睛鼓吹第五次反“围剿”获得了什么“光辉的胜利”、“北方战线上胜利更为伟大”等等。但是,事实终究是事实,到1934年10月上旬,敌军已进抵兴国、古龙冈、宁都、石城、长汀、会昌一线,中央革命根据地已大大缩小,中央红军已经完全处于被动,只有突围转到外线才能取得生存了。

第二节 长征的决定和准备

长征的决定和准备,要分开来讲,这是因为中共中央作出长征的决定之后,当时掌握军事大权的李德仍然热衷于与国民党的军事对抗,并没有积极地作撤退的准备,因而直到几个月之后,才准备长征。所以说,红军进行长征是十分仓促的。

长征是什么时候决定的?

关于红军长征的决定,是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广昌之战失败后作出的。

1934年1月下旬,国民党在镇压了福建的“人民革命政府”和第十九路军之后,重新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进攻。在敌人新的进攻面前,博古依赖于李德的军事领导,而李德不但要红军在重要城镇、大居民点、交通要道、隘口等处构筑堡垒,处处设防,仍企图以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顶住国民党军,而且经常轻率地要红军以主力对敌人的堡垒阵地或是有堡垒作依托的敌军发动进攻。由于根本方针的错误,从1934年1月到3月,红军没有能够在战役上和战略上击破或打乱敌人的进攻部署,也没有能够取得战术上的胜利,反而使得自己遭到重大损失,中央革命根据地逐步缩小。4月10日,敌人集中11个师进攻广昌。李德仍是采用原来的错误的作战方针,不顾红军连续作战,已经十分疲劳、减员很大的情况,匆忙调集9个师的兵力,在广昌及其以北地区同敌人“决战”。广昌保卫战一共进行了18天,虽然给予敌人重大杀伤,但是红军也伤亡

甚多,被迫于4月27日晚撤出广昌。这是一次阵地战、消耗战,对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广昌之战失败后,中央红军是不是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在瑞金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讨论结果,是决定红军主力准备走。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是隶属于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必须经过共产国际认可方能算是有效,所以,在这次书记处会议上同时决定,要请示共产国际,取得共产国际的指示。

这次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的时间,据史料记载,是在长征出发前5个月,按此推算,是在1934年5月。李德曾经说,“突围的准备工作从1934年5月开始”,^①实际指的是做出长征决定的时间,这和史料所载的时间是吻合的。

对中国共产党关于进行长征的决定的请示,共产国际是有回答的。据罗迈(李维汉)在后来的一次讲话说,共产国际曾经回电同意红军转移地区,时间在长征开始前的三个月。

193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中,提到共产国际1934年6月25日有一份来电。来电称“苏区主力红军退出的事情,这唯一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首先是趋于保存活的力量及在新的条件下来巩固和扩大自己,以待机进行广大的进攻,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从这份来电的时间看,同罗迈所说的时间相近,但是由于尚未发现原电报稿,所以还不能断定罗迈所说的回电就是这份来电。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作了决定,共产国际表示同意的情况下,关于红军将要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作战略转移的打算,在党的领导人的讲话、领导机关的指示和报刊文章中,不断地有所透露。如:

1934年7月8日,博古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会上讲演,曾

^① 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1980年12月印刷。

说到：“工农红军已经必须，而且能够分拨一部分力量直接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红军直接对日作战的时期已经日益逼近，我们全体的红色军人，应当准备着在任何时候率领全国民众，进行神圣的抗日战争。”

8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简称红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的《红星》报发表了题为《红军抗日先遣队已过闽江》的消息报导。报导中说到：“我们工农红军今年‘八一’全体誓师，在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胜利决心下，准备全体北上抗日。”

8月4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在部队中解释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的指示》，其中说：“我们红军的主力，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时期是更加迫近了”，“准备全部出动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8月16日，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七十期发表《使红军抗日先遣队的出动成为真正的广大的武装民众民族革命战争的开始》的社论，也谈到了同样的内容：“当红军直接对日作战的时期已经日益迫近的现在，准备直接对日作战是我们的迫切任务。”还说，为红军主力直接北上抗日，“要加强政治的和军事的准备”，要“一致紧张的动员起来”。

广昌战役后，到当年的7—8月，“战略大转移”之说已经不断提出。如9月29日张闻天在《红色中华》第二三九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文章指出：红军必要时应当“突破封锁线转移地区”作战。

这些文章或讲话，都对红军将要转移有了暗示，不过有的很隐晦，有的较明显。看了这些文章，或听了这些讲话，有些同志已经预感到将要撤出中央苏区。例如，董必武就是看了张闻天的文章后，“猜测红军可能要转移了”的^①。

但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做出的将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的决定，并没有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也没有就这件事在干部和红

^① 《董必武传记》，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9页。

军指战员中作过解释工作，没有在党内、军内进行宣传教育。

做出转移的决定后，中共中央书记处曾经召开过四次会议。在第一次会议上，决定成立“三人团”，“由三人团处理一切”。但是后来的实际情况是“三人团”主要管军事，而且是形式上的。“三人团”的成员是博古、李德、周恩来，而实际是政治上博古作主，军事上李德作主。例如中央红军转移时党政干部谁走谁留下这样的大问题，就没有在“三人团”内讨论，完全是博古决定的，周恩来迄未与闻。1943年11月3日，博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过：“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政治错误。”“干部的处理我负全责。”^① 遵义会议决议也指出：“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因此在军事上，特别在政治上，不能提高红军战士的热情与积极性，这不能不是严重的错误。”^②

广昌之战以后，党中央虽然决定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书记处做出决定后还上报了共产国际，共产国际也表示同意，但实际上，主管军事的李德并不积极地作撤离的准备。这一点，从他拟定的《五、六、七三个月战略计划》中可以看出。这个计划根本没有提保存有生力量的问题。正如刘伯承所说：“1934年4月广昌战役（4月11日—4月28日）一、三、九军团曾与陈诚纵队硬拼了十八天）后，红军主力损失颇大，敌各路已迫进赤区中心，此时从事内线作战已无胜利可能，应该退却，保存红军实力，转到广大无堡垒地带去作战，创造新苏区，以保卫老区。在三次‘左’倾的5—7月战略计划上，根本未考虑这个问题。”^③

1934年5月中旬，红军进行了保卫建宁的战斗。6、7月间，在古龙冈以北地区进行了反击作战。后来，国民党军相继占领了建宁

① 《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3页。

② 《遵义会议文献》，第18页。

③ 刘伯承：《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情况》（提纲节录），见《遵义会议文献》，第89页。

和古龙冈以北的银龙下等地。中央革命根据地进一步缩小。7月上旬,国民党军调整部署,以31个师的兵力,从六个方向,开始了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地区的全面进攻。这时,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人力、物力已经十分匮乏,然而,李德拟定的《8、9、10三个月战略计划》,虽然开始提出战略转移的问题,但是仍然忽视保存有生力量的问题。他采取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错误方针,继续同占优势的国民党军拼消耗,即所谓“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8月5日,国民党军集中9个师向驿前以北地区发动进攻。红军在高虎脑、万年亭到驿前约15公里纵深构筑阵地固守。在6日的高虎脑、半桥防御战,13日的万年亭防御战中,红军击退国民党军的多次集团冲锋,使蒋介石的精锐第八十九师丧失战斗力退出战斗,但自身也伤亡很大,不得不于27日放弃驿前以北的全部阵地。其余各路敌人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推进,红军在温坊地区歼敌一个多旅,但是这改变不了整个的局面。结果,红军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到9月下旬,中央革命根据地已经只有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联成的一块狭长地区了。

很显然,一面说要撤出,要转移,一面却还是“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在这种矛盾的指挥下,是不可能认真地进行长征的准备的。周恩来后来在中央的会议上回顾这一时期的情况时说:六届五中全会后,李德成为实际上的总司令。广昌战斗,博古和李德亲自去前方指挥,后来虽然有了退出中央苏区的计划,但是“真正准备出发是9月”。这就是说,直到1934年9月,才真正准备出发长征,向新的地区转移。

所以,尽管决定长征是在出发的几个月前,共产国际表示同意也是在出发的三个月以前,但总的说来长征是在缺乏准备的情况下开始的,正如遵义会议决议所指出,“是仓猝的出动”。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就是“长征”这个提法,当时并没有。当时的叫法是“突围”、“转移”。突围以后叫作西征,从1934年11月以后的六个月,中央红军一直是向西挺进的。到了1935年5月,中央

红军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渡过金沙江以后，就长驱北上了。

什么时候才有“长征”这个提法的呢？

据现有资料考查，最早用“长征”这个提法，是在1935年5月。该月，红军总司令发布了一个《中国工农红军布告》。这个布告中说道：

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

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

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

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

再进一步推算，发布这个布告，是在1935年5月12日会理会议之后，党中央决定经冕宁过彝族区到安顺场北渡大渡河的时候。

第三节 红七军团北上抗日

在中央红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长征之前，中共中央曾经派两支部队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一支是以中央红军第七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深入国民党区之后，到闽浙皖赣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出发的时间是在1934年7月上旬；一支是中央红军第六军团，于7月23日受命“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对于这两支部队的使命，周恩来在后来的回忆中曾经说过：一支是探路，一支是调敌。

当时，错误路线的头头王明，在一篇《六次战争与红军策略》的文章中，把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把这两支红军部队的离开根据地出征，说成是第五次反“围剿”的“新阶段”的“新策略”，这个“新策略”实现的第一个结果，是红七军团的“东往”，“新策略采用的第二个结果，就是红六军团的西征”。“红七军团北上和红六军团西征，不过是实行新策略的一部分和开端。”1935年1月他又发表文章说：“数月之前，红军就决定了应用新的策略方法。这些新的策略之第一次实际的运用，就是红七军团在今年（1934年）7月所实行